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  
研究中心丛书

# 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儒学文化研究集刊》

(卷二)

徐洪兴 小島毅 陶德民 吳震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已出书目)

鉴往瞻来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洪兴 主编

牟宗三三系论论衡

杨泽波 著

识仁与定性

——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

郭晓东 著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朱义禄 著

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徐洪兴 小島毅

陶德民 吴震

主编

责任编辑：陈军盛亮

封面设计：陈萍

ISBN 978-7-309-06671-5



9 787309 066715 >

定价：28.00元

本卷集刊由中国常州光能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 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

——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儒学文化研究集刊》

(卷二)

徐洪兴 小岛毅 陶德民 吴震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徐洪兴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7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ISBN 978-7-309-06671-5

I. 东… II. 徐… III. ①君主制-政治思想史-中国-文集②君主制-政治思想史-日本-文集③君主制-政治思想史-韩国-文集 IV. D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6130号

## 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

徐洪兴 小岛毅 陶德民 吴震 主编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陈军 盛亮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253千  
版次 200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309-06671-5/D·415  
定价 2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2007年9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中日学术论坛的结晶，收录了徐洪兴、小岛毅、韩昇、伊东贵之、李天纲等16位中日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于历史上东亚三国，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在王权思想上所受儒学理论影响的问题，是近年来东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本书所选取的论文，多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视角出发，探讨儒家理念对于中、日、朝三国历史上王权思想的演变和最终形成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论文多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如日本中世的宗教文化与当时日本王权思想的关系、东亚历史变革时期朝鲜和日本两国对于中国儒学理论不同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等。这些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东亚思想史以及东亚关系史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编委会

编 委(以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陈 来 陈卫平 杜维明 甘 阳

郭齐勇 李明辉 吴 震 小岛毅

徐洪兴(主编) 杨国荣 张汝伦

# 目 录

## 天皇与中世文化

——以文化的政治性为中心

胁田晴子 / 001

## 论魏晋南北朝对高句丽和倭国的册封

韩 昇 / 016

## 奈良时代的王权论

保立道久 / 027

## 中世日本王权的分裂与统合

近藤成一 / 037

## 宋代经学中的“尊王”思想

——以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为例

徐洪兴 / 050

## 水户学的王权论与国体观

小岛毅 / 069

## 明清交替与王权论

——在东亚视野中考察

伊东贵之 / 079

## 17 世纪朝鲜朝的王权论

——以宋浚吉、宋时烈思想为中心

洪 军 / 117

18 世纪怀德堂的学术与政治思想

——以五井兰洲的《百王一姓论》为线索 陶德民 / 129

19 世纪前半期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及王权论

——以洪直弼为例 山内弘一 / 148

织丰政权与外来宗教

胁田修 / 161

澳门与“中国礼仪之争”

李天纲 / 166

近世琉球的王权与基督教

渡边美季 / 181

试论清代的皇权与刑事司法

王志强 / 190

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

狭间直树 / 207

天皇主权意识在构建明治宪法体制中的作用

冯 玮 / 219



# 天皇与中世文化

——以文化的政治性为中心

胁田晴子

## 一、引言——天皇与权威

战国时期，天皇完全没有权力，甚至还为生计所困。尽管如此，战国诸侯都企图上京都，挟将军、天皇以令诸侯，从而获得名分。将军的权威自是不论，但是为什么天皇会成为全国统一的象征了呢？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以及织田信秀和毛利元就因勤皇而被传颂的现象为何会在战前发生呢？为什么业已支配全国，权力稳固的德川幕府没有使天皇制解体，反而不得不加以维护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学界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对于天皇制的研究，天皇权力强大的古代和幕末及近世是研究的中心，而以探讨失去权力的天皇制为何能一直存续为视角的研究则很少。一般认为，把失去权力的天皇和皇室救出来的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统一政权。但是，对于为什么统一政权要拥戴天皇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解释。而认为天皇的权威是自古有之、万世永存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治时代编造出来的。因为不清楚天皇虽然没有权力，却能一直存续的原因，所以从宗教性和神秘性方面对其进行解释的倾向性很强。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天皇也许确实掌握并保护着宗教势力，但是其自身却并没有宗教性，而是救济的对象。

最近，近世及幕末的天皇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但是，理解天皇这样的存在状态的关键，则是在战国时期以及中世时代。本文就是要通过对中世时期天皇

的状态进行分析,研究为什么几乎没有一点权力的天皇,其权威会上升,并成了国家统一的象征。对此问题,想先简要给出本文的结论:

第一,在战国时代,天皇一直是反对政治分裂的核心,民众也常以天皇之名进行暴动或自治。这就成为了其他企图统一全国的势力所不能忽视,并不得不利用的政治条件。

第二,本文指出,那些被称为自古有之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有许多都是在这个时代与天皇结合起来的。其原因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民众文化与贵族文化合体,形成了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共通的文化基础。而在此时代之前的文化传统,则是在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那些以下犯上而成功的人最终都是获得官位加入贵族行列一样,作为民众文化而产生的能乐、狂言、连歌等也都是作为贵族文化的修饰,在艺术上得到了升华。而民众生活提高的结果是贵族文化在民众层次上普及,这也使得作为贵族文化宗家的天皇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与官位、宗教、文化的效能等只是贵族内部和武士上层的共有物的时代不同,在中世后期及战国时期,形成了在相当程度上深入社会底部的文化基础,并不断普及于一般民众。在官位制方面,作为村落内部的疑似官途身份制,权兵卫、平右卫门等称谓也不断普及<sup>①</sup>。为什么这样的意识会形成呢?这里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说明。

这种形式的共通基础的形成,是因为以天皇为核心而成长起来的文化、宗教等占有优势地位。而官位制等作为这种文化优势地位的集中表现,是以天皇和朝廷为中心发挥其机能,并逐渐大众化的。

我认为,这种大众化的形成,是这个时代显著的生活习惯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比如,作为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在村和町中展开的结果,工商业者虽然扩大了自己的生意圈,但是以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前提,也使大名统制自己领国内的经济成为了可能。作为支配者,战国大名不仅在经济和产业上,而且在宗教、文化上的统制也变得非常必要。与这种支配、统制、编成的动向相适应,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和寺社的权力也在进行着变化和编成,这就是使天皇权威上浮成为可能的主要条件吧。

---

<sup>①</sup> 藪部寿樹:「中世村落における宮座頭役と身分官途、有徳、徳政」,『日本史研究』325号,1989年;『日本中世村落内身分の研究』,校倉書房,2002年。

## 二、天皇权威的编成

天皇制为何会存续、为何会具有权威，这确实是个谜。长久以来，从咒术性的祭祀王权和律令制的官职阶层制方面进行解释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就不得不对这种超历史的制度得以存续的条件进行说明。网野善彦提出的以非农业民为基础的天皇制论曾风靡一时<sup>①</sup>。的确，在镰仓时代，朝廷公家政权实行的是向管制商工业者的方向进展的政策<sup>②</sup>。而室町时代，幕府实行的是同样的政策。朝廷是在幕府的保证下，实施这种政策的。而在室町幕府衰退后，朝廷难以在战国大名的政策之下发挥力量。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室町幕府要保证天皇权威呢？这是因为，在南北朝内乱中，幕府既然把天皇作为傀儡建立了北朝，为了不使之成为政治分裂的核心，就不得不与天皇一体化，并将国内权力一元化。这是一个政治力学的问题。再转到下面的时代，应仁之乱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东军掌握了天皇和将军之后，西军把南朝的皇子带来作为傀儡天皇，并建立了从将军到天台座主一应俱全的小朝廷<sup>③</sup>。

再把话题转回到足利义满。对于他的幕府来说，南北朝统一的意义非常大。在那之后，他借助中国的名义，得到日本国王的封号。这是出于与天皇相对立的考虑。另外，他对禅宗的发展、保护和统治的宗教政策、通过输入中国物品而进行的中国文化的导入，还有对民间兴起的猿乐、田乐、茶道等文化的培养和支持，都是企图将其作为公家主导的宗教和文化体制的对立物，借以向幕府中心体制发展。义满在进行与宫廷文化同一化政策的同时，也提出独自的主张，显示出文化中所含有的政治意义。在某种方面，可以说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天皇的政策是义满对天皇政策的延伸。他们为什么都无法否定天皇呢？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名分吧。

再回到最初，我认为，与其探讨天皇权力基础的来龙去脉，倒不如探讨为什么会出现几乎没有权力的天皇在战国末期权威会不断上升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① 网野善彦：『日本中世の非農業民と天皇』，岩波書店，1984年。

② 胁田晴子：『日本中世商業發達史の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69年。

③ 百瀬今朝雄：「応仁・文明の乱」，『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3』，岩波書店，1976年。

永原庆二<sup>①</sup>引用佐藤进一的观点<sup>②</sup>，以镰仓时代产生的官司承包制，即被称为“家职”的官僚贵族的世袭制来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天皇拥有最高的“家职”，其权力包括“宫廷仪礼的主持和执行”、“官位授予”、“元号制定权”，这就使得天皇拥有了超越性的权威。对于类似“家职”制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建构，就不得不探讨其在历史社会中的意义。然而，我认为并非上述天皇的三项权力能使天皇本身得以存在，而是因为天皇作为最高权威者存在着，所以这些权力能才属于天皇。这些权能，中国的皇帝也有，而且是世袭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权能没有从天皇那里被夺走？依我个人之见，所谓的“家职”制，是把广义上的社会分工加以制度化，又经过世袭化、固定化后的产物。从朝廷官职的世袭化来说，天皇正处于其顶点的位置上。足利幕府无论是从武力上还是从宗教和文化上都无法把所有的分工编成归纳到自己的属下，是与无法否定处于这个分工编成体系顶点位置的天皇有关的吧。

而且，战国时期，随着幕府将军的权力减弱，以天皇为核心的向心力向更接近底层的广泛基础推进。进行统一的政权也不得不利用这一点来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时期的天皇权威，正是基于在这样的分工编制和政治力学关系中占据了实质性的位置。

### 三、天皇的宗教统治

在公元10世纪的“延喜式”体制下，天皇作为延喜式内社对各地的知名神社进行收编，授予官位和神田。天皇还掌握着神官的补任权。而且，按照僧纲制，朝廷和天皇掌握着僧官的任免权。这就意味着，作为世俗权力的王权将司祭者置于其支配之下，即王权高于教权。在院政时期，作为地方长官的国司更将在地领主阶层所信仰之神以诸国一宫制的形式加以整编。这样的公权强大、教权弱小的传统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对于比叡山的山门（延历寺）领来说，其拥有不入权，在此基础上拥有领主裁判权。即使犯人逃进山门内，检非违使也不能进入山门进行搜捕。但是，天台座主（山门长官）的任免权是由天皇掌握的，所以如果天皇撤换天台座

① 永原庆二：「歴史的存在としての天皇および天皇制」，《科学と思想》172，1989年，同「前近代の天皇」，《歴史学研究》467号，1979年。

② 佐藤进一：『日本の中世国家』，岩波書店，1983年。

主的话,那么这个新的天台座主就会把犯人放出来。因此,与庄园领主的权力相比,公权更加强大。庄园领主的权力中的不入权和检断权(警察裁判权)都是受到条件限定的。相应的,在强力的中央集权性的公共权力之下武士的权力也得到孕育,与其说这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倒不如说它与统一政权相结合的一面更加强了。

作为王权的天皇权力比教权优越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许多不分神佛的教学理论,很容易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守护国家的理论,而难以拥有自己的独立性。考察一下虎关师鍊(1278—1346年)的《元亨释书》等佛教史书被附带在大乘经一起献给朝廷的缘由,就可以明白了<sup>①</sup>。在此基础上,以蒙古袭来之后开始具有影响力的神国思想为基础,神道理论得到了整理和完备。以伊势神道、《神皇正统记》、吉田神道等为基础,天皇中心的理论形成了。这些神道理论对于认为天皇是开辟天地之主的子孙及具有绝对性的说法有很大的影响力。即天皇并不是作为咒术的祭祀王权而存续下来,而是在神道理论中其就处于这种位置的。

第三,在宗教观念与意识还没有分离的前近代社会,文化也不能离开宗教的土壤。比如,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学者的原关白一条兼良,不仅有许多与《源氏物语》等文学及和歌、连歌相关的著述,而且正如《日本书记纂疏》所写的,他的文学活动与神道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本著述又对吉田兼俱及其子清原宣贤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考虑到文化的政治性,在自己的廷臣中有文化上最优秀的名家,这对天皇中心思想的传播和散布产生很大影响。

#### 四、文化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编成的具体情况

如前所述,中世后期及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前只是贵族的占有物的官位、宗教和文化等扩展到了一般民众之中,形成了更广阔的文化基础。在此前提下,开始出现了体制编成的现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即原本是贵族文化核心的天皇权威也不断为民众所知悉。比如,到了这个时代,第一次使得天皇对共同体层面上的神进行编成成为了可能。可以说,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现象,是在这个时期初次出现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天皇权力,与原始时代和古代的天皇权力绝不是同一种东西,而是以时代发展为前提产生的。

<sup>①</sup> 今枝愛真:『元亨釈書』,『国史大辞典5』,吉川弘文館,1985年。

例如，在天皇的僧官和神官任命权支配下的寺社，在这个时代整备本末关系，是社会不断向天皇靠拢的重大原因。本末关系的整备是指商工业中形成一国单位的独占圈<sup>①</sup>等的一轨制化。

那么，这种编成，从中世后期到战国时期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下面从各方面来说明一下。

## 1. 官位秩序的渗透

越后守和摄津守等头衔、五位六位等位阶、法桥法印等僧纲位、神官位，还有神位、敕愿寺，以及上人、国师、禅师、香衣等的敕许，这些虽然没有实质意义，只是空名而已，但作为名分和名誉是如何变化发展的，还是要考察一下。因为这些名号可能成为反对大名的领国支配的反体制派的核心，所以大名不得不把它们作为统制的工具加以利用。这正是植根于当时地方状况的政治力学上的问题。

### (1) 俗人的官途号

官途敕许的问题，在镰仓幕府的初期就存在。源赖朝与其弟源义经的不和，也是发端于义经擅自委任官吏。即使朝廷只是名义上的，但是官位的授予对于源赖朝来说也是与权力的二分化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统制和官位申请权的独占，对于镰仓幕府来说，是重点的课题，对于室町幕府也是一样。幕府通过掌握官位申请权来向权力的一元化努力，但是如果无法独占官位申请权，就会导致权力的二分化。官位是一把多刃剑。而无法实现一元化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公家本所领庄园的土豪和庄民们常有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官位的机会。

在畿内的农村，当地的武士通过拜托领主的公卿和有实力的武士，买到“某某守”的封号，作为其在战场上的名分。另外，也有亲王家等不向朝廷申请，擅自任命杂任（下级）官员的情况。以拥有官位申请权而组织土豪的，则有土佐的一条家、飞驒的三木家、伊予的西园寺家等公家贵族出身的大名。

对于授予对象的地方大名和领主来说，官位并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伴有实际利益的情况也很多。大内义隆为了进攻九州，要求得到太宰大貳（没有统帅情况下的最高官）。当然，作为政府机构的太宰府是有名无实的，他所要求的是其名分。

<sup>①</sup> 胁田晴子：『日本中世商業発達史の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69年。

应仁、文明之乱中在京都参战的大内政弘早在文明十八年(1486年)就对其家臣的官位申请权实行了统制,禁止擅自任命官吏。在大内贯彻这种方针的基础上,下级的官位实际上并不向朝廷推荐,而是通过大名自身的许可加以任命。这样的官途称呼的认可,不能不说是大名只是在利用官途称呼对其组织进行支配。作为大名,无论是自己授予,还是充当中介,间接授予,只要是加以统制使之一体化就好。这种倾向不仅将军和大名有,而且也扩展到了地方领主。这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立性,但是领主的支配领域无法用独一无二的身份来表示,而不得不用更普遍的官途名作为身份表示,这就形成了在与顶头上司的权力和与自己相邻的权力进行对抗时,不得不与握有最高权威的天皇相联系的局面。这在很大意义上就被纳入了天皇权威之网。

如上所述,这种倾向已经影响到了村和町。经过了南北朝动乱期,在中世后期的村落和町,为公认孙兵卫、平右卫门等称号所举行的仪礼和宴会,被称为“官途成”。这虽然不是兵卫尉这样的正式名称,而是略称,但却是官位秩序向庶民社会渗透的过程。这恐怕是因为在全国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包括各个分散的村落和町及领国在内都有要求普遍性和中央性的倾向,而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官位秩序恰好能适应这种倾向的缘故。

### (2) 神位、神官、僧纲制、国师号、禅师号、香衣等的敕许

如前所述,天皇在“延喜制”体制下选定各国的知名神社,分等制定了神社的级别制度。而神社因其等级而得到位田,是有实质利益的。但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盛行的神位、神官、僧纲制、国师号、禅师号和香衣等的敕许都只是名誉称号。战国时期更是每况愈下,向更下层的人广泛颁发这些名号,以致形成了买卖名誉职号的状况。出卖名号所得的钱,成了天皇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金额不是很大,但是这也多少可以贴补天皇家的财政开支。这也成了天皇势力衰微的象征。不过,这并没有否认社会权威是以天皇家为顶点进行集中的倾向。而且,与自己体制内部的阶层制相比更令人瞩目的是,宗教势力的僧纲位和神职等外来名号受到朝廷和天皇的任免权的约束这一事实。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在各宗派的本末关系统合的进程中组织起来的以天皇为顶点的体制。

### (3) 由敕愿寺进行的编成

本来,敕愿寺是古代按照天皇的意愿,为了守护国家和祈祷天皇的玉体安稳而建立的寺院。但是到了中世纪,其他寺院可以通过申请而成为敕愿寺。敕愿寺称号可以提高由守护大名等建立的寺院的等级,所以提出申请的寺院很

多。另外，由地方领主捐赠而建成的寺院，为了和守护大名进行对抗，提出申请敕愿寺的例子也有。三河国的大树寺是德川家康先祖松平所建的寺院，在天文四年、五年的时候，成了敕愿寺。当时正是今川义元吞并三河国的时候。此寺院以敕愿寺的称号，获得了守护使不入权和德政免除权。

织田信长也通过朝廷的命令，归还了被家臣泷川伊予守（一益）没收的敕愿寺伊势国金钢寺的寺院领地。若狭国羽贺寺原来是祷告的地方，虽然丹羽长秀将其没收，但是根据信长的命令，寺院的领地也得到了归还。作为统一的权力，只有像秀吉那样作为关白大权独揽，或是像德川政权一样制约朝廷的权力这两种情况吧。

以敕愿寺为挡箭牌，坚持大名权力不入权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本愿寺。本愿寺的敕愿寺化、贵族化，很容易令人认为这有悖于本愿寺自古以来一直坚持的保守化。但是，事实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在由寺内町而形成的自我领国化，由反抗大名镇压而形成军事力的同时，这个时期本愿寺的贵族化，是其向教团目标迈进的一环。作为新兴势力，和既存的寺社权力一样，没有庄园领以及与之相连的不入权的本愿寺，为了获得领有权费尽了心思。贵族化就是为了获得这个特权的重要一环。以莲如之子实如为首，还有其他的子女，都迅速地与公卿们联姻。其中，与劝修寺教秀的女儿的婚姻意义重大。后来，后奈良天皇和青莲院宫尊镇法亲王的生母、劝修寺局藤子、还有与其有亲戚关系的三条西实隆的子孙们都对本愿寺的贵族化作出了努力。结果，本愿寺的证如在劝修寺的局藤子的引荐下成为了大僧都，本愿寺终于成为敕愿寺。由此，大阪寺内町获得了诸公事的许可和守护不入权。本愿寺还获得了地子钱的征收权和德政免除权。永禄二年（1559年）更获得门迹的敕许。而且大阪寺内町获得特权后，其他寺院也都要获得与其同样的权力，因此其影响迅速波及各地的寺内町。从当时各地的农村兴起的在乡町——小都市，常通过得到本愿寺的名号来获得自治。本愿寺可以说是以最强大的方式获得敕愿寺命名的成果的。

## 2. 神祇的编成

### （1）神国思想的兴隆

天皇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天皇作为开辟天地之神的子孙统治国家的神国思想。蒙古入侵之后，神国思想开始受到鼓吹，神道理论由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而得到整备。关于这一过程，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另外，黑田俊雄指出，对于显密佛教来说，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都没有什么新的理论。他还



指出了中世时期神道的世俗性格<sup>①</sup>。当然，神道是对佛教理论脱胎换骨地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其社会构造中，这种方法有其自身的效果。按照本地垂迹的说法，在地的共同体虽然把神祇编成起来，但是后来的神道家们则把处于低位的神祇加以分等。根据这样的神道理论，伊势和吉田的神宫、白川神祇伯等积极地从共同体神和地方名神的组织和编制中超脱出来，其神的等级开始上升，并向皇室祖先神合并。这尤其是在中世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现象。

到了战国时期，文明十六年（1484年），吉田兼俱提出唯一宗源神道，在祭祀诸国的诸神的大元宫开始进行神道的编成活动。兼俱向天皇奏报说，皇大神宫的神器降临到了吉田社。天皇于是将其作为议定所，前去拜迎，并命令将其安置在大元宫。虽然伊势神官，以及三条西实隆、甘露寺亲长等硕学公卿强烈反对，但是天皇依然授予亲笔题写的“大元宫”匾额。后来，吉田家和神祇伯白川家竞相开始神社的组织化，这与寺院的本末关系整备和商工业方面的独占权形成的动向是一致的。

兼俱之子清原宣贤继承了其父的《神代抄》，将其与一条兼良的《日本书记纂疏》进行了比较和取舍，并自己对其进行解释，其对林罗山的儒家神道也有继承。宣贤主张某种泛神论，即认为自然、人间等所有的生命和创造的现象都是一心或心王，由此主掌天地人三才。这在表现心性的同时，还有国土开辟以来，素戔鸣命以后的神国之王主掌天地人的意思，即主张作为神的体现者的天皇的绝对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素戔鸣命呢？这是因为作为祇园社（现八坂神社）祭神的疫病神的牛头天王后来变成了保护善人的神灵，到了镰仓时代以后，作为记纪神话中被逼迫的神与素戔鸣命相折衷而被信仰。这种折衷说最早出自吉田家的《释日本纪》，所以我认为这出自吉田家系统。这个神道理论也渗透到一般的生活里，并成为穿插在能乐和狂言中的台词。

此后，天皇追崇因反抗幕府而被流放的后鸟羽上皇，尊其为水无濑神，并发出把地方名神、共同体神与皇室祖先神加以调和的指令。另外，乡村神社组织的数目很多，仅仅已经查明的属于吉田家系统的就有83个。此外还有白河家的，所以数字会更大。不向天皇奏请，就获得批准的例子与大内擅自赐予官衔的例子同样如此。那么，获得这些头衔有什么好处呢？这也与敕愿寺一样，都可以获得武士不入权并作为神田，成为免税地。

<sup>①</sup> 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法藏馆，1983年。